

李匡夫 著

主论：建设和改革深层理论慎思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论探索

分论：全国及国际学术讲坛聘言

荣誉著者之言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论探索

李匡夫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论探索
李匡夫 著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4号 邮编:100860)

山东省城乡建设勘察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98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定价:12元

ISBN 7-80115-087-2/F·7

序　　言

中国的开发，是本世纪和下世纪摆在几代人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开发”与“发展”有相近的含义。当前，“发展研究”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等新学科相继问世，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纷纷出台。“中国的开发研究”当然也应当归类于发展研究的范畴。但是，基于如下三项理由，本书特别强调“开发”这一概念：

第一，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土开发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城镇化、商品化、工业化程度等等，还都处于后进状态，也就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所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可是，这种发展主要不是现有社会形态的外延发展，而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中，从事经济与社会内涵的开发和充实。只有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得到了充分开发，中国才能使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步起来，才能在总体上呈现发展的态势。

第二，强调国家和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处于改革的非常时期，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常规的发展，而且要充

分发挥全体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加倍的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把“左”的路线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开发”一词远较“发展”一词更能体现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体现中国人民主动进取，勇于开拓前进的精神。

第三，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开发优势。中国不仅需要开发后进地区、后进领域、后进环节，而且更有优势需要开发。譬如自然资源的优势、劳动力数量的优势、历史文化的优势等等；而最大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需要大力开发。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了几十年，但由于缺乏驾驭这一制度的经验，以至使它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正如一套最先进的生产线还未被读懂，而难以充分展示其性能一样。本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如何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开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取得开发中国的最佳效益。

中国今天面临的大开发，是自近代史开始以来迄今未解决的一个既富挑战性又极其重大的课题。它有一大批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如：开发的性质、实质，内容、方式，目标、模式，途径措施，战略方向，动力机制，宏观调控，政策策略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都急待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归纳起来，可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目标模式理论；二是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动力机制理论；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宏观调控理论；四是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政策策略理论。

当此之时，每个热血的中国公民，无不努力探索祖国社会经济开发的最佳目标、最佳途径、最佳模式；而且这一探索随着每一次经济形势的大起大落，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动荡波折，而日趋急切。本书作者也是探索者中的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实际的，别开生面的，认真负责的系统研究；并把自己有关该问题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研究成果，提炼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

论探索》一书的“主论”。进而又把本人曾经宣之于高层次社会科学学术讲坛的材料——近年来作者所获入选的 19 篇全国及国际会议的与本专题有关的论文内容，辑为该书的第二部分——“分论”。这样主论与分论成经纬纵横之势，互为犄角，互相参证，立体地烘托出了“开发”主题。

这本书应当说是一部观点醇正、新颖、严谨的理论专著。作者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论的系统观点(即该书主论部分)，固然是精心撰制的；而分论之 19 篇文章也不同于一般参会人员的即席讲话。它们是经过全国性会议或国际性会议的组织者，从大量征文中筛选出来的，因而其思想性、学术性，也应是篇篇有相当的质量。而且该 19 个学术会议基本覆盖了中国社会发展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所以这些论文不仅有研究深度，也有足够的广度和包容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系统看法，保证了本书主题所需要的足够外延。

当然，中国的开发，毕竟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以作者一人之力，不要说搞深搞透，哪怕在此问题上有一得之见，能做一块引玉之砖，并且不出现大的偏差和失误，就可以说贡献不菲了。对于本书，我不想讲多少溢美之词，也不讳言它有若干薄弱环节和失误之处，只希望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来关心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发这一命题，在阅读和评价本书的同时，努力使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决策水平同上一个新台阶。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大有好处。

郭丙于

1997 年 6 月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

主 论

(建设和改革深层理论缜思)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主 论 | |
| (建设和改革深层次理论缜思) | |
| 第一章 话说中国社会经济开发问题..... | (1) |
| 1.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三次大开发谈起..... | (1) |
| 2. 社会经济开发的基本原理..... | (3) |
| 3. 试解开发难题——亚洲何以在近代落伍? | (8) |
| 4. 中国行将到来的大开发是一场社会革命 | (11)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目标理论 | (15) |
| 1. (总体)社会开发目标 | (16) |
| 2. 经济开发目标 | (19) |
| 3. 具体社会开发目标及其与经济开发的关系 | (27)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道路“模式”理论 | (30) |
| 1.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道路的选择 | (30) |
| 2. “龙”型社会经济开发模式在地方上的实践 | (32) |
| 3. 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开发模式的优势和特点 | (36) |
| 4. 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开发模式的健全和完善 | (37)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动力理论 | (41) |
| 1. 以改革为动力,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41) |

| | |
|-----------------------------|--------|
| 2. 改革的重要任务——调整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 (43) |
| 3. 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劳动组织中的(宏观)管理关系 | … (50)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宏观调控理论 | … (56) |
| 1. 开发宏观调控功能要立足国情 | … (56) |
| 2. 宏观调控的几点原则 | … (58) |
| 3. 开发宏观调控功能的具体思路 | … (66)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政策和策略理论 | … (71) |
| 1. 关于“对人的管理”的政策和策略理论 | … (71) |
| 2. 关于“对物的管理”的政策和策略理论 | … (75) |
| 3. “管人”和“管物”的关系的政策和策略理论 | … (82) |

分 论

(全国及国际学术会议聘言)

| | |
|-----------------------|---------|
| (一) 社会开发 | |
| 1. 中国社会经济开发八策 | … (87) |
| 2. 论“乡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 | … (104) |
| 3. 论由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 … (115) |
| 4. “龙”型社会经济开发模式及其亚洲意义 | … (132) |
| 经济开发 | |
| 5. 健全行政机制,搞活大中型企业 | … (133) |
| 6. 城市自身腹地的开发 | … (136) |
| 7. 关于我国开发脱贫的战略 | … (140) |
| 具体社会开发 | |
| 8. 在社会转型中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 … (145) |
| 9. 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心理调查 | … (158) |
| 10. 跨世纪教育的崭新培养目标 | … (167) |

11. 开发老年余热 (172)
12. 从金华“腊”文化内涵看社会的开发 (175)
13. 我国人才宝库开发的典型研究 (184)
14. 为社会经济开发创造良好的廉政环境 (190)
15. 地方开发中的一项区划论证 (194)

调控与政策

16.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 (199)
17. 行政调控规律概说 (210)
18. “参政党”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231)
19. 把社会经济开发纳入秩序的轨道 (235)

第一章 话说中国社会经济开发问题

中国正面临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经济大开发。所谓开发，是指社会的开发和经济的开发；更准确些说是以经济开发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开发，就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充分发掘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经济，根本性地改变社会面貌，改变人民生活方式，创造崭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的开发，在现阶段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了使这一开发顺利进行并取得最佳成效，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针，从人类社会经济开发的总进程入手，掌握基本事实和来龙去脉，从中找出总规律、总趋势来。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高屋建瓴地去把握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具体规律、具体趋势，从而卓有成效地采取相应开发对策，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1.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三次大开发谈起

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口以及道德、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时尚等等，无不时时发生着急剧的或缓慢的，突发的或渐进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变化。

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历史上每一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都曾带来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如石器、木器、火、弓

箭、陶器、种植、驯养、文字、青铜器、铁器、机器、电气、核技术等等，都是如此。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的三次大的飞跃，带来了人类社会三次大规模的开发。

用火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开发。火是人类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它使人类开始熟食，扩大了进食范围，增强了体质和适应能力；它给人类温暖和光明，使他们有可能克服气候的限制，开拓方便广阔的栖息地，使人类永远告别了与野兽杂处的“巢居”时代，足迹迅速遍布五大洲；它可以御寒，可以加工石器和木器，制作工具和武器，为人类创造出大大不同于野兽的生存环境，奠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建立起稳定的以渔猎采集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实行母系氏族制度的原始群落和部落。

大约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和普及带来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开发。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了定居生活，创造了村落和城镇，也带来了手工业，进而带来了氏族制度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最后由国家将它们取代。血缘社会变成了地缘社会，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充分开发了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在农业小生产基础上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正是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工业生产力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开发。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一起突破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藩篱；机器大工业更打破了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僵局。农业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产业系统，在工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商业、信息业等多种产业系统林立交错的新的社会格局中，农业成了工业的一个部门。把全体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既不再是血缘关系（氏族），又不主要是地缘关系（土地），而是在专业化大生产中的产业归属关系——“业缘”关系。第三次大开发揭开了现代化社会的序幕；种种现代化社会的场景，在《第三次浪潮》一类的大量书刊中都有详尽的描述。

从以上对人类社会不断开发前进的粗线条的描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及恩格斯等各有一套较细致的分期法)中,可以看出全球社会经济开发的大趋势——由蒙昧到开化,由野蛮到文明,由采集到生产,由农业到工商业,由贫穷到富足,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以用火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为其基础的生产力发展的综合水平,曾对人类社会开发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而在生产力总和中,科技发明又是最根本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回顾历史,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开发的基本原理。

2. 社会经济开发的基本原理

上面所讲的世界范围的三次大开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而具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大洲,其开发情况则各有不同。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原始先民,各自独立地开始了社会经济的开发。史实告诉我们,尽管其开发大趋势是一样的,但其进程和效果则各异:

——大洋洲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仅独立地进行了第一次大开发,没有能够进入农业阶段,始终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直至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美洲独立地进入第二次大开发,它也发明了农业,尽管曾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但其开发“档次”比较低,仅仅发展到了氏族制度刚刚向国家转变的阶段。

——欧洲的农业出现比较晚,一般仅有五六千年历史,但它首先开始了第三次大开发,进入了工业社会。

——亚洲率先进入农业社会,早在公元前8千年到7千年,西

亚的两河流域，便出现了农业，继而北非尼罗河流域、我国的黄河流域、南亚次大陆的恒河流域等地也都开始了农业的开发。可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农业社会发展得最充分的地方。但也是世界上最迟、最难进入工业大开发的地方——世界第三次大开发正式开始于英国 17 世纪的工业革命，几百年内席卷了欧美，而在亚洲却迟迟难以“登陆”。一直过了几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四小龙”之属，才借西方之力，搭上了现代化的列车。

这样，围绕着世界各地社会经济开发，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一个：为什么欧洲上去了而亚洲落伍了？这是一个近代史又推给现代史的历史难题。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提出过“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人口决定论”、“宗教决定论”或“多因素论”等若干观点；而这些观点大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其中，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论”和美国亨丁顿为代表的地理社会学的观点曾发生过很大影响。前者认为：宗教是一种独立于人而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伦理有很大影响的力量；西欧的宗教改革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在 16、17 世纪进入不了资本主义，就是缺乏宗教条件，而儒学则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背离的。后者则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但它企图用各民族生存的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解释各民族间的差别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由此证明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是自然条件造成的结果。结论当然都是错误的。

要准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解释，只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

着社会状况”。^①而生产力的总和则是指：“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②等。毫无疑问，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生产力这一最深层次，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三次大开发的历史，只有用生产力才能解释清楚。其它如制度、人口、文化、心理等因素，与生产力相比都称不上根本原因。它们只能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发挥作用。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地方，无论什么人种的居民，无论实行什么制度，无论流行什么文化，生产力所决定的开发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总和”是个集合概念。它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素质、科学技术、劳动关系、生产资料、自然条件；而且，每项内容并不是等重的，各自的重要性是随时变化的；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一般总是其中某一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极其缺乏征服自然的能力。“自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条件）”一项，在社会经济开发当中，特别是第一、第二两次大开发当中，常常是关键性的。举例来说，人类发明用火，只有遇到天然火种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自然条件，人类也许至今还要茹毛饮血。再如，马（和马车）的用途和贡献是相当大的，它不仅是工具而且更是动力，在机器出现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们被广泛用于生产、运输、通讯和战争，为发展经济、拓展和巩固封建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动物资源完备，六畜俱全，受益极大；而美洲则除了羊驼（又称美洲驼，能负重，但力气不如毛驴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家畜，故该洲虽然地域辽阔，极宜发展农业，但是直至 16 世纪还滞留在原始社会，始终没能从氏族社会进入国家形态，这与该洲动物资源匮乏当然大有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3 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是在第三次大开发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科技因素以几何级数突飞猛进,越来越取代“自然条件”成为社会经济开发的决定因素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可是它们几个世纪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总和,足见科技因素富含巨大能量。但是,单纯科技因素也不能决定一切。譬如:同是科技因素,为什么在有的国家就可以大有作为而在其它国家就没有用武之地呢?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历史,还要看到其它生产力因素的作用,即“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劳动力素质”、“生产资料”等项。不可以死守教条,固执一端。

这里就会产生一种疑惑:既然生产力的要素竟有五项之多,那不是可以随手拈来任何一项以“解释”历史吗?

原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该体系中,生产力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但是生产力(各种因素)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必须是在适宜的社会形式下进行,正如使用电脑必须借助软件一样。这个体系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体系。马克思在他称之为“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著名表述中,这样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

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从这段表述中可知：

第一，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最根本的因素；

第二，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二者统一为生产方式；

第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基础，上层建筑建立于其上并有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

第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上述被决定项各对其决定项有反作用。

以上五项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考察一个社会，必须同时用五项，即马克思的全部表述来衡量。譬如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社会面貌，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力因素都起着决定的作用，而是说“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项基本适应的情况下能决定”；或是说“生产力最终能决定”，或说“生产力总和能决定”。再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正、反作用问题：从世界历史三次大开发的进程中，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产力不可抗拒的决定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力量。特别在第三次大开发中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只有建立起便于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实现开发。而在亚洲，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历史惯性，来得特别大，以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难以建立，或者即使建立起来也迟迟难以发挥作用。

了解了社会经济开发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试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